

西北大学现代经济理论与实践丛书

中等收入陷阱的
东亚式规避：
韩国经验及其启示

宋 宇 杨佩卿 等 著

How to Avoid the Middle-income
Trap in East Asia:
The Korean Experience and Its Enlightments

014062227

F131.264

04

西北大学现代经济理论与实践丛书

中等收入陷阱的东亚式规避： 韩国经验及其启示

How to Avoid the Middle-income Trap in East Asia:
The Korean Experience and Its Enlightments

宋 宇 杨佩卿 等著



科学出版社

北京



北航

C1749285

F131.264
04

内 容 简 介

本书以韩国为例研究中等收入陷阱东亚式规避的经验、途径、方法与启示，本书的核心要义在于通过探究韩国规避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功经验，为中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迈入中高收入国家行列提供理论与实践启示。因此，本书以分析韩国经验为用，以探究为中国实际可资借鉴的政策议题为体，沿着财富→发展理念→社会建设→制度建设的分析理路全面剖析韩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历史实践，从而窥探出一般性的发展规律。

本书适合经济、管理、金融等财经类相关专业的本科生及硕士阶段的研究生参考和阅读，也可供相关领域的经济学研究者在研究中国相关问题时作为参考和借鉴。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等收入陷阱的东亚式规避：韩国经验及其启示/宋宇等著.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4

(西北大学现代经济理论与实践丛书)

ISBN 978-7-03-041718-3

I. ①中… II. ①宋… III. ①经济发展—研究—韩国 IV. ①F131.2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96538 号

责任编辑：李 楠 / 责任校对：彭立军

责任印制：肖 兴 / 封面设计：无极书装

科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京东黄城根北街 16 号

邮政编码：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新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4 年 9 月第 一 版 开本：720×1000 1/16

2014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14 1/2

字数：292 000

定价：6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作者简介

宋宇，男，1966年生，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数理经济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区域经济学和企业家行为。承担国家级、省部级和国际合作项目10余项，在《中国社会科学》、《中国软科学》、《经济评论》等期刊发表论文30余篇，已出版著作包括《现代西方经济学名著导读》、《转型时期企业家机制论》（合著）、《建设西部经济强省的战略思路与对策》等。

杨佩卿，女，1989年9月生，陕西省富平县人，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生，主要研究领域为政治经济学。在省部级以上报刊发表《五位一体：现代化建设的科学布局》、《“新四化”导引下的延安城乡一体化实践与探索》等多篇学术论文，参编《中国西部经济发展报告（2013）》、《科学发展观学习全书》等多部学术专著。

丛书编委会

顾 问：何炼成 白永秀

丛书主编：任保平

编 委：（按姓氏拼音排序）

钞小静 何爱平 马莉莉 任保平 茹少峰

师 博 宋 宇 王 珏 吴 航 吴振磊

杨建飞 岳利萍 赵景峰

总序

党的十八大以来，伴随着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实现创新驱动、推进城乡一体化、加快生态文明建设、转变对外开放方式等成为了亟须关注的问题。如何运用现代经济理论分析这些新的经济现象，解读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经济增长质量、生态文明、城乡发展一体化等焦点问题；如何将理论上的模型与中国的实践相结合，把西方经济学的经典理论中国化；如何站在新的开放格局下更科学地认识东亚经济发展和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发展等都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理论经济学科是西北大学经济学科的主体，拥有百年的发展历史，通过几代人的努力，该学科得到了提高和发展。“十二五”以来我们一直坚持将现代经济学的基础理论与中国当代经济实践相结合，一方面注重对经典理论的总结，特别是从比较的视角来分析问题；另一方面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用现代经济理论解读现实问题。“十二五”以来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理论经济学依托政治经济学这一国家级重点学科和省级重点学科建设项目不断凝练学科方向，形成了后改革时代与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研究、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与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比较研究、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研究、东亚经济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经济新发展研究、比较经济思想史研究、数理经济模型及其应用研究、丝绸之路经济带研究等方向。

为了把这些方向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加以总结和提炼，展示我们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在理论经济学方面的最新进展，我们和科学出版社合作出版“西北大学现代经济理论与实践丛书”。本丛书共计 10 本，具体包括任保平教授的《经济增长理论史》、白永秀教授的《后改革时代城乡发展一体化理论与实践》、杨建飞教授的《中外经济思想：理论与典籍》、何爱平教授的《以生态文明看待发展》、茹少峰教授的《宏观经济模型及应用》、王珏教授的《东亚经贸关系——中国的视角》、宋宇教授的《中等收入陷阱的东亚式规避：韩国经验及其启示》、赵景峰教授的《当代资本主义经济新变化与发展趋势》、钞小静副教授的《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区域评价研究》、师博副教授的《中国能源效率改进的增长绩效研究》。本套丛书的特点可概括为以下几方面。

(1) 按照“理论—实践—历史”的框架构建丛书的框架。理论方面的书籍包括《后改革时代城乡发展一体化理论与实践》《以生态文明看待发展》《当代资本主义经济新变化与发展趋势》，其把我们近年来关于城乡一体化、生态文明、当代

资本主义的成果集中体现了出来。侧重实践的书籍包括《宏观经济模型及应用》《中等收入陷阱的东亚式规避：韩国经验及其启示》《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区域评价研究》《中国能源效率改进的增长绩效研究》《东亚经贸关系——中国的视角》，其把我们对数理经济学、经济增长质量、世界经济研究的新成果反映了出来。经史方面的书籍包括《经济增长理论史》《中外经济思想：理论与典籍》。

(2) 突出了比较研究的思路。本丛书体现了比较研究的思路，比较研究是我们近年来在理论经济学研究方面逐渐形成的新方法，由我们经济学系主任何爱平教授负责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比较研究”已经出了三本著作和大量的文章，在学术界已经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本丛书中继续体现了比较研究的思路，例如，《中外经济思想：理论与典籍》在思想史方面形成比较研究，《中等收入陷阱的东亚式规避：韩国经验及其启示》在发展问题研究上比较了中国和韩国。

(3) 推进了一些有传统历史的新方向（如数理经济学）。西北大学最早在国内研究数理经济学，1982年2月22日至3月2日在西安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召开了第一届全国数量经济学年会，许多天才的青年经济学家，如杨小凯、张维迎、田国强、胡传机、茅于轼、王书瑶、刘世锦等，出席了此次年会，并在后来成为主流经济学在我国的开路先锋，有的甚至在世界范围内具有一定影响力。早在1982年，经济学系胡传机教授就已经把协同理论引入了经济学，并在1987年出版了《非平衡系统经济学》《开放系统经济理论论文集》。遗憾的是1982年第一届全国数量经济学年会后，现在看起来在当时非常先进和前沿的数量经济学并未发展起来。2008年我负责本科教学时，进行了专业改造，建立了数理经济学专业，2011年组建了数理经济学系。在数理经济学系主任茹少峰的带领下，2013年我们在科学出版社出版了《数理经济学》教材，在此基础上茹少峰教授带领数理经济系的教师完成了《宏观经济模型及应用》一书，这标志着对我院有传统历史的新方向的一次推进。

(4) 从国际视野关注当代中国经济发展实践的突出问题。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问题，其中的诸如经济增长质量、城乡一体化、能源问题、中等国家收入陷阱等在本丛书中都得到了关注。而且本丛书从国际视野来关注中国的现实问题，如《中等收入陷阱的东亚式规避：韩国经验及其启示》《当代资本主义经济新变化与发展趋势》。

当代中国处于大转型时期，这一时期的许多重大问题需要我们的理论经济学予以积极关注。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理论经济学将持续研究中国转型时期的重大时代问题，积极推进我们的经济学科建设。是以序。

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任保平
2014年2月

前　　言

2012年11月下旬的一个中午，我从位于首尔东郊的建国大学公寓匆匆动身，登上前往仁川的地铁。韩国的深秋初冬之际，是这个东方半岛国家最为美丽的季节。随处可见的红叶呈现出一年中最美丽的颜色，宽阔的汉江静静流淌，与绵延的群山一起，构成交相辉映的自然风景。质优价廉的诸多明洞化妆品商家、颇具特色的九老服装市场、鳞次栉比的如意岛金融中心大楼、首尔郊外美丽的2002年世界杯足球场，以及接近水原市的成均馆大学理科校区中完美搭配的先进教学大楼与淳朴的校园自然风景，标志着韩国发展中的有形物质文明，即使下着小雪也不停息的在位于首尔国立大学校区内的冠岳山上登高健身的中老年人群、仁寺洞韩国传统艺术家表演中清淡悠扬而打动人心的歌声、朴槿惠女士成功当选总统之夜光化门外各种年龄支持者们载歌载舞狂而不乱庆祝的喜庆场面，以及梨花女子大学校区外众多小剧场中的韩剧演出、已经略微久远的1988年奥运会体育公园中经常响起的强劲的韩国流行音乐，这些正是韩国文化中历史感、现代感与活力的象征。

我的目的地是仁川月尾岛，这是一处著名的风景胜地，与繁忙的仁川港比邻。向西眺望，不时可以看到起落于仁川国际机场的航班，壮阔的大海清澈深沉，与亚洲第三长的仁川跨海大桥一起，在夕阳下构成一幅绝美的图画，而更远处就是中国了。我其实不止一次来过这里，但总是意犹未尽。在各种天气下，领略变幻的组合画面，多数是与朋友或者独自一人，也与韩国的中学生、成年人、老人交谈，但其实并不知道在寻找什么。晚上回建国大学公寓的时候，从仁川站上车时地铁上只有三个人，一个穿迷彩服的年轻人满嘴酒气，在车内走来走去，嘟囔着我听不懂的韩语，后来他竟然开始赤手空拳去砸车窗玻璃，结果被很快赶来的工作人员带走了。后来听韩国朋友解释，大概是正在服兵役的士兵受了委屈以后发泄的表现。这也是我所遇到的这个已经可以称为中等发达国家的不和谐音符之一。

韩国这个东方半岛国家，近半个多世纪以来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技术等，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韩国人自称是日本之后唯一一个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的发展中国家，虽有自夸成分，但大致属实。虽然韩国未来的发展面临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难题，但其迄今为止的经验教训值得总结。

本书从经济学角度，结合近年来国内外广泛关注的中等收入陷阱问题，从发展模式、发展动力、产业结构、发展理念、社会资本等方面，试图构建一个结合经济发展理论与韩国经济史的框架，对以往相关研究加以梳理，并结合我们自己

的研究，尽可能加以新的拓展和认识。尽管关于韩国经济的相关研究并不少见，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研究则刚刚兴起，本书试图结合这两个方面研究，并非对韩国经济的全面介绍，也不是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理论或实证分析。

作者才疏学浅但不揣冒昧，虽知道这一工作的意义，但在研究中更多感受到其中的难度，框架的构建也远未完成，之所以把这一尚不成熟的书稿付梓印刷，也是希望能够提出一个较有意义的问题，对思考中国相关问题者有所助益，收到抛砖引玉之效，则也算是一种收获。

宋 宇

2014年6月于西安

目 录

第 1 章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需要广泛借鉴韩国经验	1
1.1 中国经济发展需要重视中等收入陷阱问题	1
1.2 经济转型与进一步改革开放中的视野调整	2
1.3 可资借鉴的韩国经验	2
第 2 章 韩国经济进入高收入国家的历史回顾	5
2.1 韩国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的终结	5
2.2 “二战”后韩国经济起飞与进入发达国家的三个阶段	14
2.3 转型之痛、治理之变与走出中等收入陷阱	23
2.4 “韩流”、三星与“新汉江奇迹”	30
第 3 章 韩国经济与中等收入陷阱的既往研究综述	35
3.1 韩国经济的相关研究	35
3.2 中等收入陷阱的相关研究	48
3.3 本书的概念框架与分析理路	61
第 4 章 发展模式：粗放型发展模式的终结与发展政策	66
4.1 韩国现代发展的三个阶段和三种模式	66
4.2 开放与走向创新范式的韩国发展模式：国际竞争与模式转型	78
4.3 韩国发展理念的变化	83
4.4 中国发展模式转型的主要议题	94
第 5 章 发展动力：投资驱动与消费驱动的升级	98
5.1 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继续依靠投资驱动的必要性与局限性	98
5.2 韩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与发展动力问题的解决	103
5.3 政府与开放在经济动力优化中的角色与整合	114
5.4 中国发展动力转变的主要议题	117
第 6 章 产业升级：改造劳动密集型产业与发展科技型产业	123
6.1 韩国经济结构的变动	123

6.2 工业化持续推进并最终完成：改造劳动密集型产业	131
6.3 把自主创新作为提升产业结构的重要支撑	140
6.4 中国产业升级的主要议题	146
第 7 章 作为深层因素的社会建设与社会资本	149
7.1 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社会建设滞后的特征	149
7.2 制度变迁中的植入与再造：开放条件下韩国社会变迁的轨迹	151
7.3 韩国的社会资本、社会政策及其变革	161
7.4 中国社会资本与社会建设的主要议题	176
第 8 章 韩国经验：对中国的启示与借鉴	187
8.1 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中国经济的现状与问题	187
8.2 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机遇与面临的挑战	194
8.3 韩国经验的可能启示	206
参考文献	217
后记	218

第1章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需要广泛借鉴别国经验

概括而言，本书结合中等收入陷阱的相关理论与比较研究，对韩国经济走出中等收入阶段、进入发达国家的历程进行了回顾，从发展模式、发展动力、产业升级、理念及制度变迁四个角度，特别是对其中的社会资本与制度建设问题，说明了其基本经验与局限性，并着重分析了其对中国的启示与借鉴。

在对相关问题进行判断时，主要有以下前提：第一，中国经济已经整体上进入中等收入阶段，虽然东部地区已经进入中高收入阶段，但中西部不少地区刚刚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其中还存在“贫困陷阱”问题；第二，中国制度建设与社会建设既面临新的历史机遇，也面临自身“路径依赖”与全球化隐含的不容忽视的挑战；第三，中国的发展理念超越经济起飞阶段的局限，正在向中高收入阶段的发展理念迈进，特别是历史、文化、制度等方面的原因，还需要不断创新和变革。

1.1 中国经济发展需要重视中等收入陷阱问题

在这一问题上，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不会掉入中等收入陷阱，但也有观点认为，中等收入阶段的风险不容忽视，拉美国家当属前车之鉴。

其实，现在讨论中等收入陷阱问题，较少提及其中的文化背景、地理因素。这一问题在不同地区、不同历史条件下有不同表现，解决之道自然大为不同。中国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是改革开放30年后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及自身经济起飞后的产物，它与拉美国家、东南亚国家的内涵不同。在过去30年里，拉美国家（如巴西、阿根廷、墨西哥）的人均收入水平停滞在美国人均收入的30%左右，属于典型的中等收入陷阱；东南亚国家（如泰国）的人均收入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已达到美国人均收入的20%，这种状态一直延续到了2010年，其也落入中等收入陷阱，2009年泰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约为3973美元，是中等收入陷阱的牺牲品。而中国与日本、韩国的文化制度因素有相同之处，如同样根发于东方社会的儒家思想、重农传统等。虽然说亚洲“四小龙”的发展证明儒家文化并非与现代经济不相容，但我们并不清楚其中传统儒家思想的转化过程。

其中的学理论争不能解决问题，必须诉诸实践。可以肯定的是，中国走出中等收入阶段还有一段不平坦的征途。传统社会形成的文化观念和生活习俗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存在。中国走出中等收入阶段，离不开创新能力的提升，离不开

社会发展与稳定共识的达成。但这样远远不够，其也并非简单的丰富且廉价的剩余劳动力转换的问题。

1.2 经济转型与进一步改革开放中的视野调整

分析中等收入陷阱问题，有理论分析与比较分析两种思路。发展经济学理论主要研究经济增长的源泉与动力问题，包括知识的增长和工业化等方面，分别适用于中高收入阶段和中低收入阶段。但这些对于分析中等收入陷阱问题远远不够。另一种思路主要进行不同国家发展道路的比较，并对传统发展道路加以反思。在许多中等收入国家的发展中，传统的发展模式难以改变，经济素质和竞争力低下，出现所谓“无工作的增长”（高失业）、“无根的增长”（降低生活质量和毁灭传统文化）、“无声的增长”（失去民主和自由）、“无情的增长”（贫困与收入分配严重不公）、“无未来的增长”（资源环境耗竭、环境污染、生态失衡）等。思考中国未来面临的问题需要正视这两种研究思路。而在从理论分析到政策分析的联系中，所谓“华盛顿共识”的局限已为人共知。一般认为应采取更积极主动的政策，这些政策应从成功进入中等发达国家经济体的实践方面理解。

1.3 可资借鉴的韩国经验

韩国被认为是一个从结构特征上看介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社会体（Tat Yan Kong, 2004），在政治制度转型中处于传统欧洲与发展中国家（亨廷顿所言的“第三波”）之间。从经济发展上看，韩国的发展与中国的转型轨迹有相似之处。如林毅夫教授所言，在许多方面，中国大陆、越南的市场化改革与韩国、中国台湾的后期工业化类似。

与中国历史文化条件相同、经济社会环境相似，但又先行一步的韩国，已经成功走出中等收入陷阱。韩国积累了许多关于创新能力形成、社会稳定的经验教训。有些观点认为，韩国是小国，国小好办事，而中国有自身的特殊性，“汉江奇迹”既不是出于远见卓识，也不是来自主动设计，而是历史事件的产物，韩国经验不足为凭。对此，我们认为，韩国至少比中国先行一步，其经验可谓“新鲜热辣”。从经济学角度看，韩国自称是“20–50 国家”（人口超过 5000 万、人均 GDP 超过 20 000 美元），经济规模明显大于中国台湾，更非新加坡这样的国家或地区可比，而且其发展中许多问题与中国类似，可供中国借鉴。

韩国的人均收入于 20 世纪 70 年代达到美国人均收入的 20%，1991 年又达到

了美国同期水平的 40%，2002 年进一步达到了美国同期水平的 50%，成功跳出了中等收入陷阱^①。不过这一过程可谓充满变数：美国把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的计划作为继续提供额外发展贷款的条件，韩国政府在不情愿中接受，并于 1972 年 8 月 3 日签发了《经济稳定与增长总统紧急状态法》；1980 年韩国经济出现负增长，对一个习惯于高速增长的国家来说，令人担心；尽管通货膨胀没有接近拉美水平，但消费价格指数年增速在 1979 年达到 18.3%，1980 年更是接近 30%，成为一个突出的政治问题；实际工资在 1980 年和 1981 年分别下降 4.4% 和 1.6%；经常账户逆差也在 1978~1980 年出现大幅增长，由于出口增长的减缓及与石油危机相连的贸易条件的恶化，1980 年的经常账户逆差占 GDP 的 8.5%；韩国首尔于 1988 年成功举办了奥运会，此后一段时间政治相对稳定，政府进一步推行的自由化措施使经济保持持续增长；发生亚洲金融危机时，1998 年经济增长率降到 -6.9%，同年物价涨幅高达 7.5%，股市暴跌、韩元贬值、政府财政赤字高企；此后，企业经营稳健性和盈利能力都有所提高。韩国似乎是一个习惯于突破某种困境或循环的国家，如为了突破“贫困恶性循环”、实现经济发展，其选择了外向型经济作为经济起飞的路径；为了克服“小国困境”、实现规模经济，其作为“小国”选择了“大国战略”；为了规避中等收入陷阱、提高创新能力，其采取了竞争优势战略等。

那么，韩国经济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如何在重化工业这一并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中形成国际竞争力？韩国的高新技术产业又是如何得以发展的？韩国如何解决收入分配差距问题？如何达成社会发展的进一步共识？这些问题将在后文给予回答。

这里只强调一点，笔者认为，理解韩国规避中等收入陷阱的主线是创新能力和社会能力的演化与升级。其中，前者是显性和机制性的，后者是隐性和基础性的，具有不容忽视的作用。如何在走向市场化体制与开放体制的过程中，维系社会秩序而不失转型的动力？例如，尽管当时的城乡差距在国际公认的范围以内，但政府却极为重视，发起新农村运动等建设。以制度建设为例，如何在面临各种内外部冲击时保障本国人民生计，是跨越中等收入阶段的关键问题；同时，社会建设不仅要提供安全网，而且具有“生产性”。例如，有效的公费医疗和教育能够改善劳动力质量、提高生产效率；福利制度能够缓解社会矛盾，为长期投资提供更稳定的商业环境，增加政治制度的合法性；失业救济能够平滑消费，进而缓和经济周期。但是，对于社会制度的条件、运行效率、管理机制及可能带来的不良影响等问题也不应忽视。

^① 按照一些发展经济学家的标准，韩国中等收入阶段开始于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1987 年的民主选举标志着韩国开始进入中高收入阶段，2002 年韩国日本世界杯的成功举办标志着韩国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一般认为，韩国的制度建设比较滞后，一种说法是，韩国拥有第一世界的经济与第三世界的制度。与日本相比，在政府干预的规模或程度上，韩国更具有全面性和强制性，同时，韩国工业垄断资本同金融垄断资本的融合程度明显低于日本。韩国资本与政府的“两者同盟”体制向政府、民族资本和外国资本的“三者同盟”体制的转换起始于1979年，虽然当时韩国的政商联盟出现了明显的裂痕，但却提供了社会转型的重要契机。与此同时，韩国“三者同盟”由于民族主义兴起而变化，全斗焕虽然血腥镇压了光州的抗议，但威权政府的权威开始衰落，需要向经济体系的代表财阀及新兴利益团体妥协，这种过程一直延续到1987年的民主选举^①；金泳三与财阀千丝万缕的联系使经济改革以失败告终；在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下，韩国财阀元气大伤，最终金大中借助IMF的国际压力成功地推进改革，使韩国真正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韩国的制度变迁具有自身的特点，如全球性组织是韩国制度变迁的外部导航者。当然，不同领域国际组织对韩国的影响不同，如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的影响要高于IMF，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在劳动市场方面影响较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则在反腐败方面有积极作用。同时，韩国在制度变迁中也注意发挥自主性。韩国是少数几个主动全面引进西方法律制度的国家之一，其建立了自由市场经济理论所要求的安全的宏观经济环境，以及法律的、制度的基础，因而在经济发展不断推进制度与国际接轨的同时能够提高适应性效率。

^① ① 诺思，瓦利斯，温格斯特. 2013. 暴力与社会秩序：诠释有文字记载的人类历史的一个概念性框架. 杭行，王亮译. 上海：格致出版社；亨廷顿. 2008.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王冠华，刘为，等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第2章 韩国经济进入高收入国家的历史回顾

韩国位于亚洲东北部、朝鲜半岛的南半部分，北部以“三八线”与朝鲜相邻，其余三面被黄海、朝鲜海峡和日本海所环抱。韩国国土面积为 9.96 万平方公里，是世界上人口密度较高的地区之一，其自然资源贫乏，原料和燃料主要依赖进口。

日本投降后，日据时代的工业大部分为朝鲜获得，而韩国仅留下了有限的农业资源，成为世界上最贫穷落后的国家之一。从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韩国经济起飞；70 年代以来，韩国持续高速增长；80 年代，韩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创造了“汉江奇迹”，一跃成为中上等发达国家、亚洲“四小龙”之典型。虽然 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对其产生了重大打击，但韩国经济仍然保持较快增长，目前是有“富人俱乐部”之称的 OECD 成员国。

2.1 韩国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的终结

国际经济发展经验表明，多数国家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经济增长极容易出现停滞徘徊，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必须通过借鉴他国经验进行结构调整，以避免重蹈南美国家和南非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覆辙，从而顺利步入高等收入国家的行列。

韩国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的终结用时短，这是其发展过程的一个重要特点。1953 年韩国人均 GDP 仅为 67 美元，直到 1963 年才达到 142.4 美元，10 年间增加不到 100 美元，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1977 年韩国人均 GDP 达到 1041.6 美元，摆脱“贫困陷阱”。1987 年韩国人均 GDP 达到 3367.8 美元，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这个过程用了 10 年。1989 年韩国人均 GDP 突破 5000 美元，这个过程只用了两年。1995 年韩国人均 GDP 达到 11 467.8 美元，突破 10 000 美元关口，成功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用 8 年时间摆脱了中等收入陷阱。

2.1.1 韩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韩国于 1977~2002 年处于中等收入阶段，1997 年以后艰难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挑战，实现了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功跨越。事实上，1977 年后，韩国的人均收入只有在 1980 年出现过短期停滞，这主要是受到第二次石油危机和国内军事政变

的不利影响。1988 年举办汉城奥运会标志着韩国进入中等偏上收入阶段，此后韩国经历了 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的严峻考验，以 2002 年韩国日本世界杯为标志，真正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近年来，世界银行（World Bank）将世界各经济体按人均国民总收入划分成低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进一步分为中等偏下收入国家、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三个层次，且每年根据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状况对区间界限值进行调整。如果一个国家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之后，经过足够的长时期增长却未能进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便是落入中等收入陷阱^①。按照此标准，除少数石油国家和欧美发达国家外，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只有日本、韩国、新加坡和中国的香港、澳门、台湾地区。

中等收入阶段主要指人均 GDP 在 3856~11 905 美元的发展阶段。韩国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的终结比日本少用时 5 年、比新加坡少用时 4 年。韩国在 1988~1995 年为中等偏上收入国家，仅用 7 年就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随后步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整个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韩国处于中等收入阶段，然而韩国不但没有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反而持续增长，最终快速、成功地跳出了该陷阱。

一般来讲，一些工业化进程早于亚洲经济体的拉美经济体，常被看作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案例。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以前，巴西和墨西哥的人均收入不断增长，随后逐步下降并停滞。在过去 30 年里，巴西、阿根廷、墨西哥的人均收入水平停滞在美国人均收入的 30% 左右。虽然不及拉美国家明显，但泰国、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也出现了相似的现象。例如，泰国人均收入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已达到美国人均收入的 20%，却一直延续到了 2010 年。

成长为中等收入水平国家之后，经济增速很可能出现下降，这是导致中等收入陷阱的一个重要原因。根据摩根士丹利（2011）的研究，在 40 个人均收入超过 7000 美元 [以购买力平价（purchasing power parity, PPP）计算] 的国家中，有 31 个出现了经济增长减速的现象，它们在高速增长后的 10 年时间内，增速平均下降了 2.8 个百分点。艾肯格林等分析了各国经济增长的趋势后指出，人均收入 16 740 美元（以 PPP 计算）可被视为经济增速下滑的拐点。以上研究表明，一国完成了以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的工业化初级阶段后，随即进入中等偏上收入阶段，经济增长很可能会失速或停止。

韩国的人均收入于 20 世纪 70 年代达到美国人均收入的 20% 后，仍然保持了稳健的增长，并没有像其他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那样出现增速下降。韩国人均收入又于 1991 年达到了美国同期水平的 40%。此后，韩国的人均收入还进一

^① 高杰，何平，张锐. 2012. 中等收入陷阱理论述评. 经济学动态, 3: 83-84.